

主编：王继平 王澧华 王立新

湘学

（第一辑）

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一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学

主 编：王继平 王澧华 王立新

本辑编委：熊治祁 李建国 刘演林
李卫国 朱汉民 宋银桂
王志忠 孟 泽 王向清



责任编辑:夏 勇
特约编辑:李沛诚
装帧设计:尹文君

湘 学

主编:王继平 王澧年 王立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55.000

ISBN7-5438-2101-X
Z·76 定价:26.50 元

目 录

湘学的历史流变·····	王继平 王澧华 王立新(1)
论湘学传统·····	李佑新(8)
略论湖湘文化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王兴国(27)

※ ※ ※

《太极图说》发微 ·····	朱汉民(44)
----------------	-----------

论胡宏的心性哲学

——兼论湖湘派理学与朱熹理学的异同·····	赵载光(58)
胡宏理欲学说探析·····	何卓恩(68)
胡宏与张栻哲学思想之比较·····	蒋九愚(77)
张栻的经世思想·····	王向清(88)

※ ※ ※

船山《尚书引义·皋陶谟》疏解 ·····	林安梧(93)
----------------------	-----------

※ ※ ※

曾国藩与刘蓉、郭嵩焘交谊考论·····	王澧华(103)
---------------------	------------

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章育良(120)

在道学与文学之间

——曾国藩的诗学及其理学源泉……………孟泽(134)

曾国藩家藏文献中的密摺和清廷密谕……………韩长耕(148)

曾国藩的军人品德教育思想……………刘子明(163)

清末曾、左如何运用孙子兵法……………姜书阁(177)

浅谈郭嵩焘的经世思想……………熊乡江(183)

论郭嵩焘的对外开放思想……………王美华(191)

老湘军略论……………杨齐福(201)

湘军史考证发凡……………祁龙威(211)

湘军的情报工作与镇压太平天国战争……………邓亦斌(218)

湘军筹饷考论……………杨呈胜(232)

湘军与哥老会……………吴善中(247)

经学家王闿运……………萧艾(263)

※ ※ ※

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汪澍白(282)

试论王夫之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夏剑钦(291)

魏源、谭嗣同的心学思想及其在近代文化危机中的

定位……………尹红英 王朴(299)

※ ※ ※

创建毛泽东方法学的几个问题…………… 沧 南(311)

※ ※ ※

《清人笔记条辨》所见张舜徽先生之治学观 …… 周国林(328)

论何绍基的诗作及其风格…………… 雷 磊(353)

萧雄《西疆杂述诗》析义…………… 王龙光(370)

※ ※ ※

论荀子的学术渊源、特殊品格及其与孟子学说的

异同…………… 马积高(382)

论《太史公自叙》本《史记》的提纲 …… 颜克述(414)

儒学的演变与革新…………… 羊春秋(429)

《孙子》及其对后世军事理论的影响 …… 余 华(449)

文道辩…………… 徐 炼(456)

一种知识型人才的崭新范式

——韦政通的学思历程及其研究特点…………… 王立新(471)

湘学的历史流变

王继平 王澧华 王立新

“湘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湘学”的历史流变情况，做一番考察。

“湘学”不是“湘中学术”的省略语，因此，湘中学术的历史并不即是“湘学”的历史，屈原、贾谊甚至周敦颐，原则上都不能叫做“湘学”。“湘学”的名称，是朱熹首先提出的，但朱熹没有讲“湘学”，而是讲“湖南学”、“湖湘学”，其意即指“湘中之学”，其实就是所谓“湘学”。为什么不叫“湘学”，这不是学理上的原因，而是地理的原因，古人称湖南叫湖湘，但不叫湖，也不叫湘，因此称湖南学术为“湖南学”或“湖湘学”。而不称“湖学”或“湘学”。“湘学”产生于南宋，朱熹及其同时代或稍后的学人们所称之“湖湘学”即是“湘学”。它的内涵与外延都十分明确，即是由胡安国所开创的，由其子胡宏所最终完成并由胡宏弟子张栻等所不断将其影响扩大散布出去的南宋时期的湖南学术。它不包括风土人情，不包括农桑手工，也不包括词章训诂以及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之类。它是宋学，所谓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的学术又有不同，不同不在于地域，称它为“湖湘学”，只是为了划分上的方便。“湖湘学”不是湖湘地产的学术，也不是湖南养育了“湖湘学”，而是闽人胡

安国携子侄来湖湘，在湖南传播理学，后遂具有了鲜明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理学派别中，卓然自立，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湖湘学”在原则意义上，应当是传统儒学在湖南生根和演变历程的凝缩式称谓。它并未超越传统儒学的范围，其核心内容依然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所谓“内圣外王”的学问。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以及客观历史环境的作用，使得“湖湘学”更重外在事功。诚然，这一特征曾被朱熹所误解，以为湖湘学者不重涵养，缺乏“本体”的功夫。其实这一点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陷，只是闽学与湖湘学风所重不同而已，称为特点似为妥贴。闽学，如果可以被称为“政治的伦理学”的话，那么“湖湘学”则完全可以称为“伦理的政治学”。这种说法虽然不尽恰当，但却可以表明二者取向的外在形式上之不同。

湖湘学者并非“不事涵养”，也并非“只务践履，不知穷理”，而是“涵养”为了王业，穷理为了践履。胡宏一再强调“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的目的，就在于强调修养功夫必须落到实处。而朱熹所强调的则是行动时体会天理。一个是即体以为用，践履本体功夫，强调的是落实。一个是即用以见体，在行动中感受天理的存在，强调的是体认。取向不同，只能表明大系统内的要素各有自己的系统，不能表明各个小系统脱离或突破了大系统，双方均是通过二程的理解而对先秦孔孟儒学的继承与发挥。

以上所论仅限于“湘学”的来由，而“湘学”并非一成不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湘学经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元时，“湘学”似已“蛰伏”了。这一蛰伏直至明亡。直到船山继起，湘学始又“卷土重来”，而且来势更猛。船山之后，湘学又消沉了百余年，湘军集团炙手可热的年代，湘

学被利用了或又实际地应用了一次。而曾氏并没有体现出胡宏与王船山的“民族大义”，却更多地体现了张栻的“忠君报国”。这不仅是在描述一个现象，而是因为曾氏本是所谓“正统”的理学传人，其于朱熹，受益颇多，远在船山之上。朱熹认张栻为同道，正是因为两人于曾氏身上所体现的“借忠君以成自己千古美名”或“以自我事功的成就，完成内心对忠孝节义的信念建构”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因此缺乏胡宏批判“世儒”的理论勇气，同时也缺乏船山对整体华夏民族前途的挚诚忧虑。而在对“湘学”核心内容的发挥上，实无自己的理论贡献。谭浏阳以后，“湘学”本质精神突然复活，为“发展”意义上的历史的负责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已经无以复加。杨度所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毓麟的“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毛泽东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等，均是最能体现湖湘学派的或湘学的根本精神的。这是从时间上讲，其实朱镕基的“不管前面是地雷阵或是万丈深渊”之类的话，也正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从地理上讲，诚如杨昌济的“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地”。另如陈独秀所谓“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甚至包括梁启超所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之类的说法，只是强调激励的意义，并不是因为湖南的红土地专门为养育人才而设。因为这里完全没有必然之理可讲。将一个实然的现实，说成是完全必然的，这本身就已经缺乏学理上的根据，更何况将这种内在必然性说成是单纯地理上的原因呢？是不是可以说山东有过宋江，这里就是农民起义的摇篮？显然不能，李自成出于陕西，洪秀全则起于广西。如果洪秀全打败了曾国藩并且推翻了满清政权，那么梁启超是不是可以说“广西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呢？历史的机缘

往往能一地之人得尽其力，而机缘不去，斯地之人自然拥有得天独厚的的发展和表现的独特机会。这并不是说这里没有必然性，否则印度为什么没有美国强大，尼泊尔为什么不具有联合国中的首席发言权？必然性是存在的，但不是地理原因。历史的机缘并不是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不同地理位置都是均等的，它仿佛数学上的坐标一样，机缘必以时间和空间（时代或时势与地理或地域）结合的方式出现，谁在坐标点上，谁就有先决的发展和表现权。但是，如果没有基本的积累和准备，机缘来了也不会生效。

湖南近世人才之盛，一是在于湖南地处中国近现代政治风暴的要冲，受害之深、反抗之烈都是其他省份所无法相比的，同时“湘学”的传统点燃了这堆干柴，这才是湖南近世人才之盛的根本原因。因此，湘学也便不应当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

我们以为：湘学既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虽然它不能不拥有历史和地理的要素。湘学，应该是个学理的概念。“湘学”，学之谓也。“湘”只是一个地理的标位，就如“北京大学”一样，它是个大学，而不是北京，只是它设在北京。“湘学”是学，它产生于“湖湘”并在湖南地区有因时代不同而或明或暗传承脉络。“湘学”虽产生于湖湘并在湖湘有极大影响，但它并不属于湖湘，而是属于华夏民族，就像北京大学不属于北京而属于中国一样，湘人因此而受益，因此而自豪可也，据而为己有，即不可以又不可能，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

“湘学”是一学术概念，它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从湖湘学派开始，到王船山，内容则已从忠君爱国，发展为具有启蒙特色的无所不包的大体系。又经谭嗣同等，进一步强化民族情感和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及至黄克强辈，则上升为大规模武力行为改革中国的行动，毛泽东则更彻底，且已将传统作为手段为共产

主义服务了，他要拯救全世界，而非独拯救中国了。当然这是“湘学”外显出来的主要的核心精神，但“湘学”不仅局限于此，它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在胡氏父子和张栻那里，应该说“湘学”主要是“义理”之学和“经世”之学，到王船山那里，又有了“历史哲学”，而且“义理之学”更加纯粹，“经世之学”更加细致，并且突破了传统的“三纲”观念，不以天下为君主所有，而试图为天下而设立君主了。湘中学术，在原来的发展中又有了经学、文学，甚至西学等，这些虽不是“湘学”的核心，但却不能不是湘学的内容了。

不仅如此，湘学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优长，以丰富和涵养自己，同时也不断补溢而造成更加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历史影响。谁敢说王阳明有“湘学”学统？但谁能否认王阳明对“湘学”的贡献？谁能说朱熹是“湖湘学派”？但谁敢否认朱熹深受湖湘学派的影响？甚至梁启超、陈独秀，难道他们不曾受过“湘学”的影响？否则他们如何敢于写湖南的学风、湖南的精神？甚至周恩来，不要说他受毛泽东的影响，就是他批准杨度入党，能不能说他没有受到来自杨度身上的“湘学”学风和湘中精神的影响？周恩来与杨度是有过很多接触的，杨度的对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国、救民，继起自有后来人。”不仅应对周恩来有激励作用，而且对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均会产生激励作用。因此，即便不是湘学学者，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湘学的影响，这一点应该说是有意共睹的事实。但是在这一点上，本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于理清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借此说明湘学的精神是活的，它曾对同时代的不同历史人物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湘学作为活的历史传统，即使是今天，也还在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因此研究湘学，就不仅具有

历史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诚然学术的价值不应当仅仅以其是否曾经对“经世”或实践产生过作用而定，学术还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理意义。有关“湘学”的学理意义，正是我们今天的研究所应注意的。

以上所论，并不是我们给“湘学”所下的定义，而只是我们对于“湘学”的一些理解而已。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湘学”研究的历史。

历史上，湘学不仅存在，而且湘学研究 with 湘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朱熹是第一个湘学研究者，也是第一个湘学宣传者。朱熹还深受湘学的影响，湘学对朱熹来说，曾经起到过促成嬗变的作用。朱熹敬畏胡宏。在自己的思想“若穷人之无归”的情况下，看到了世间惟一的一束亮光，这就是胡宏。朱熹因此对已发、未发问题有了更加真切和更加深刻的理解。其后朱熹又与张栻讨论学问，涵养了自己，也使得自己从一个湖湘学派的执迷者变成了湖湘学派的研究者，朱熹并与湖湘学派中的优秀士人如胡广仲、胡伯逢、胡大本、胡大时、胡大壮、吴晦叔、彪居正、赵师孟等有着广泛的接触和深厚的交谊。湖湘学派因为朱熹的“鼓吹”和“诂难”而名噪一时。应当说朱熹同时代的吕祖谦和朱门的一些弟子，甚至包括后来的真西山等，都是湘学的宋代研究者。

朱熹对湖湘学派的研究结论是两面的。一面是指责，一面是肯定。指责如对《知言》的“八端致疑”，如说张栻“只重践履，不务穷理”，如说湖湘学者“只拔捻子不添油”，不注重培壅根本之类。肯定如说五峰思维精到不可及，如说张栻名质好，学问正，是他见识高，且能从善如流之类。

第二代湘学的研究者，应当是王船山，船山不仅研究湘学，

而且发展了湘学，钱穆以为船山是胡宏的“后劲”，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船山使湘学更精微、更博大、更复杂了。

从原则上讲，曾氏湘军集团，虽受船山影响，但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湘学研究者，虽然他们都应当是湘学中人，他们应当是湘学精神的行动践履者。

第三代湘学的研究者应当是刘人熙、欧阳中鹄和谭嗣同辈。他们不仅承继湘学，而且研究湘学。梁启超似亦应算这一代湘学研究者之列。而稍早的王闿运等，更确切地讲不应是湘学的研究者，应是湘军的研究者。

湘学的第四代研究者，杨昌济应是其中之佼佼者，他将湘学的精神传播给了毛泽东等。

第五代湘学的研究者应当是钱穆、侯外庐、嵇文甫、牟宗三等，他们花费了心血，取得了成就，但都不是专职研究者。

现代的湘学研究者们应当是第六代。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会把湘学的研究当成终身的职业。本书即《湘学》就是为了这一代学人研究湘学提供专门的理论阵地，它寄望于湘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突破，超越前贤，开启来者。这是我们编辑此书的宗旨，也必是所有研究湘学或对湘学热心关注的学者的共同愿望。

论湘学传统

李佑新

一 理学遗绪

湖南，北阻洞庭，南薄五岭，西接黔蜀，风气锢塞，不易为中原人文所沾被，自古是所谓“三苗之地”。“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①至北宋庆历年间，元公崛起，湖南始出一大思想家周敦颐。周援佛、道入儒，融合《易传》、《中庸》与佛道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范畴，而其核心则归本于“性与天道”。濂学传为洛学，演为闽学，复又流被于湘学。二程后学以杨时与谢良佐最为有名。通过杨时与谢良佐，二程洛学影响胡安国、胡宏父子。通过胡安国父子以及后来讲学于岳麓的朱熹（朱为杨时三传弟子），由周敦颐肇始的理学复辗转流播于湖湘。

胡氏父子是湘学奠基者。胡安国“避乱荆门”后，迁居南岳，筑碧泉书院，授徒讲学，“上蔡（谢良佐）之传，始自胡文定公（胡安国谥号）入衡湘。”^②胡宏继承父业，游悠衡山20余年，先后讲学于碧泉、文定、道山等书院，远邦朋至，近地风从，“卒开湖湘之学统”^③。胡宏弟子中以张栻（号南轩）最为著

① 《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文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5页。

② 《宋元学案·上蔡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162页。

③ 《宋元学案·五峰学案》，《黄宗羲全集》第四册，第669页。

名，是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他遵父命从胡宏问学于衡山，史称衡麓之教。后来张栻创建长沙城南书院，又主讲于岳麓。尔后朱熹到长沙，访南轩，讲学城南、岳麓两书院，二人相互敬佩，切磋触发，学术益进。从学者风云而至。朱、张会讲，对湘学影响深远，湖湘士人从而奉程朱理学为正宗，形成深厚的程朱理学传统。

南宋灭亡之后，湘学在元明数百年间一度处于消沉状态。而近世理学在湘学中的抬头，首先表现在以魏源、贺长龄为代表的湖湘经世学派的思想中。魏源曾就学于岳麓书院，后成为清代今文学派的著名代表。今文学是对乾嘉考据学的反动，就理学传统而言，考据学家严分汉宋之学，依汉排宋。今文学家的特点之一则是不薄宋儒，企求泯灭汉宋的界限，甚至有的唯宋学是尊。魏源一方面深受湖湘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为今文学之大家，其推崇宋学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与魏源交往甚密的贺长龄，是清嘉道之际湖湘经世派的著名代表，但他平生笃宗理学：“长龄究心理学，其立身五行也，治事设政，一以宋儒之学为本。”^①长龄之弟贺熙龄，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亦以理学为轨辙。其婿劳崇光，官云贵总督，立有助绩，而深于宋学。

理学在湘学中的复兴，则以湘军人物为代表，其中以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人最为著名。由于曾国藩等人的提倡，理学在道咸之际得以重张其帜。梁启超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得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

① 《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4页。

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①

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其社会功能无疑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被理学家所高扬的“理”，实际上就是封建之“礼”：“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②“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信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③理学家所鼓吹的这一套，最鲜明地体现在曾国藩的心性修养、政治实践中，使他成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他以儒生领兵，出而征战，就是要“扶持名教”，使“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国藩之后，继承这一衣钵的是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他们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攻击与曾国藩出而镇压太平天国的理由如出一辙，认为“立学首正人心，损益乃百世可知，纲常实千古不易”^④，时务学堂“倡为平等，民权之说”，乃“阴行邪说”，使学子“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⑤。湘学中这一深厚的理学传统，使得湖南在近代历次社会革新运动中，守旧势力颇为顽固。

但是另一方面，理学在以哲学阐释封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志结构，从而也蕴含着人文的价值。它强调立志、修身及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倡导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这对湖湘士人有着深远影响。曾国藩生平咬牙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故居门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② 《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77页。

③ 《朱熹文集》卷五十九。

④ 王先谦等：《湘绅公呈》，见《葵园四种》，第875～876页。

⑤ 王先谦等：《湘绅公呈》，见《葵园四种》，第876页。

联)；“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① 罗泽南“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同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污辱莫大焉。”^② 可见，理学所倡导的心性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对于湖湘士人咬牙立志、拔起寒乡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正是这一方面，通过杨昌济，成为毛泽东、蔡和森青年时代讲求心性修养以及新民学会砥砺品行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 实学风尚

湘学传统最显著的特征，是理学与实学的结合。一方面注重心性修养和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则是讲求实学和经世致用的学风。湖湘学派是由其创始人胡宏的弟子张栻得以宏扬的。朱熹与张栻会讲岳麓，两人的思想便有歧异之处。张倡导“行得便见得”，“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他既注重明义利之辩，又不尚空谈，主张以“经世为要务”，因而具有“事功之学”的意味。张栻之后，其高足胡大时，既从朱熹问学，又受业于永嘉事功学派创始人陈傅良门下。这就在湖湘学派中抹下了一层实学的色彩。

如果说，湖湘学派创始人的经世实学风格还不很突出，那末，到了明清鼎革之际的王夫之，则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之作作了宏扬和阐发。他在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提出“理气相依”、“知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9页。

② 钱基博、李肖聃：《湖南近百年学风·湘学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